

现代社会学时期的社会福利理论

毕天云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2)

内容提要:社会学与社会福利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合关系,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福利的基础学科之一。在现代社会学时期,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福利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和冲突论的社会福利理论,提升了社会学研究社会福利的理论水平。

关键词:社会福利 现代社会学 社会福利理论

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与社会福利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亲合关系:社会学产生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或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也在这一时期诞生;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越来越需要社会学的帮助,社会学也越来越关注和重视社会福利问题,并成为研究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显学”之一(另一门显学是经济学)。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上,古典时期(19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家们不太关心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没有形成社会学特色的理论成果。^①到了现代时期(20世纪40年代—70年代),社会学家开始摒弃古典社会学不重视社会福利问题的态度,积极介入社会福利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福利进行探究和解释,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和冲突论的福利理论。^②这不仅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社会福利的视野和思路,而且提升了社会福利研究的理论水平。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社会学理论家族中的“家长”,其集大成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 Parsons)。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帕森斯开始把福利国家纳入社会学研究的领域,这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福利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此后,帕森斯及其门徒开始尝试以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来诠释社会福利存在的意义,使社会福利的研究提升到

理论研究的层次。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社会学中的社会福利理论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福利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福利本质的认识。该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属于社会系统中的整合制度(integrative institutions)之一,其重要性在于促进社会的效率、稳定和秩序;任何社会都具有共享的归属感和团结的情绪,所以,社会福利制度既是社会归属感的原因,也是社会团结的结果,由政府建立社会福利机构和提供福利服务是为了达成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默顿和斯梅尔瑟等对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干预解决社会问题都持相当支持的态度。二是对社会福利发展的认识。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西方福利国家的产生主要受社会结构本身的成长过程(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加速社会的成长变化)和结构变迁(由工业化、都市化和科层化等推动的结构功能分化)两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福利需求,并形成所谓的“问题压力”。问题压力透过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参与来影响政府政策,要求政府以自己的公共权力来干预市场机制的运作,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福利需求,以克服福利供给上“市场失灵”。因此,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结论就是:社会福利的兴起与发展是对社会的结构功能分化的功能性反应,政府透过社会

①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从实证主义和社会有机体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结构,假设社会结构具有关联性和整合性,以此暗示人类社会的持续特质与稳定形态。在他们眼里,以解决社会不稳定为对象的社会福利,自然而然被视为短暂而过度的矫正行动,社会问题解决之后,社会福利也应当随之消失。深受19世纪末社会病理学家观点影响的斯宾塞,曾经严厉批评社会改革方案,认为慈善性的社会改革方案只会阻止社会进化的规律发挥作用。在孔德和斯宾塞之后的古典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对社会问题不是不感兴趣,就是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改革行动持有怀疑态度。迪尔凯姆以道德而非政治或经济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改革问题,与斯宾塞持有相同的态度,认为贫穷是与生俱来的。而韦伯最感兴趣的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及其结果,基本没有涉及社会福利。因此,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欧洲社会福利的研究主要以社会道德的观点,采取简单的社会调查方法以揭露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如布思(Charles Booth)对伦敦地区的贫民进行调查,郎树(Seebohm Rountree)在英格兰北部约克城的贫民研究。

②这一结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就社会背景而言,当时欧美各国政府积极广泛地干预社会福利服务,需要寻找理论上的依据;1974年石油危机之后,面临一系列“福利危机”的欧美福利先进国家逐渐缩减其社会福利支出,社会福利研究者试图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政府政策的转变。就学术背景来看,在二战以后,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界曾经独领风骚,但为时不长;在结构功能主义达到顶峰的同时,各种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派随之诞生,出现了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时期。

福利服务来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乃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功能必要性”,是为了达成社会系统的整合与均衡。

根据分析角度的侧重点不同,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具体观点。①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Economic-determinism*)是持结构功能主义观点来研究社会福利的最早也最具有实证性的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对社会福利的解释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偏重社会福利的量化研究,主张从各个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归纳出一套理论原则,来验证其经济因素影响或决定社会福利发展的假设。经济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卡特莱特(*P. Cutright*)、瑞姆林格(*Caston Rimlinger*)及加伦森(*Walter Calenson*),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家社会福利模式演变的比较研究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是福利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原因,选择不同的社会安全福利服务也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另外,人口结构、都市化因素及政治结构也与社会福利有密切的联系。②聚合理论。聚合理论(*Convergence Theory*)又称为“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其理论假设来源于卡尔 1962 年出版于伦敦的《工业主义与工业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一书,该书强调技术因素在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卡尔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原子本质的趋势,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犹如原子扩散一般,逐渐扩大其范围与深度,政府管制和分配社会福利服务,慢慢取代原有以市场来分配福利资源。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务以“需求”为分配依据,从前工业社会的慈善福利和家族福利,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职业福利或国家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发展显然是具有阶段性的,从放任模式或缺缺模式经过自由模式,最后扩充为制度的福利模式,逐步扩大由政府来分配社会福利资源的范围。总之,工业技术的发展是自变量,社会福利模式是因变量,工业技术的发展是决定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的先决条件。③共识理论。与从经济和技术角度解释社会福利发展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不同,共识理论(*Consensus Theory*)则是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剖析社会福利,具体分为理性决定论(*rational determinism*)和道德决定论(*moral determinism*)。理性决定论强调社会福利是对社会问题的社会需求的“理性”反应,认为人类为解决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透过政府的介入,建立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乃是一种社会大众的理性反应。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如英国学者蒂特马斯(*Richard H. Titmuss*)和马歇尔(*T. H. Marshall*)。道德决定论又称为“社会良知理论”(*social conscience theory*),是约翰·巴克(*John Baker*)在 1979 年发表的《社会良心和社会政策》(*Social con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一文中提出来的。它强调社会福利的“道德”本质,认为社会福利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道德办法,通过政府干预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政策显示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爱心”和“慈善”精神,社会政策源于人们逐渐加深的社会责任感和人们对“需求”认知的增加。

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具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如

重视工业化、都市化与社会福利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与社会福利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与此同时,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有四:①单因论。就影响社会福利形成和发展因素的分析,结构功能主义非常强调经济因素和工业技术因素,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和工业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制度化的社会福利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所有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②西方中心主义。以经济或技术来分析社会福利的发展,其基本假设可以归纳在“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范围之内,本质上仍是以西方社会为中心的理论。因为西方社会是经济和技术发展较早和较快的社会,所以,在社会福利发展上,西方社会是非西方社会的“榜样”,非西方社会的福利模式演进就是“拷贝”西方的历史。③客观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属于价值中立的福利理论,只重视社会福利存在的“客观性”、“技术性”和“操作性”,忽略了社会福利所具有的“主观性”、“价值性”和“意义性”。④趋同论。结构功能主义试图建立起社会福利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并希望这些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社会(国家)的社会福利及其发展,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采取了“异中求同”的方法。这虽然可以凸现社会福利的一致性和相同性,但它无法诠释社会福利的差异本质,也无法完整地运用到所有社会的社会福利分析,不能有效地说明不同社会福利之间的差异,这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的最大缺点。这些缺点的存在使结构功能论的社会福利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被冲突观点的社会福利所取代。

二、冲突理论的社会福利理论

在现代社会学理论流派中,冲突理论是在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动”中产生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的整合和均衡,忽视或忽略社会中的对立和冲突;冲突理论指出社会具有“两幅面孔”,重点揭示了社会中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和米尔斯。达伦多夫在 1959 年出版的《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一书中提出冲突理论模型,把社会体系视为分工、敌对、异议、冲突、非整合和变迁的系统,认为社会体系的冲突来源于利益和权力分配的不平均,个人或团体为争夺有限的利益和权力,势必导致社会体系的冲突。

现代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模型出现后,一些学者尝试用于社会福利研究。冲突论的社会福利理论建立在团体冲突和阶级冲突的假设之上,认为社会福利的存在并非是社会价值共识的结果,而是在阶级利益对立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优势团体(即统治阶级)用于缓和冲突与对立的策略或手段。其主要观点有:①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生是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的产物;②社会福利服务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和稳定具有重要贡献,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和更圆满的运作;③社会福利服务具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有助于缓和或消除阶级冲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阶级统治;④社会福利发展的原动力通常来自于统治阶级本身,社会服务措施

往往是统治阶级主动采取的,因此,社会福利是社会的一种“规范性政策”(normative policy);⑤透过政府干预行动所试图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及社会对立问题的各项措施,只会引起新的矛盾与对立,即福利国家在维持某些方面的社会结构稳定的同时,也造成某些社会结构动摇的结果。

运用冲突论观点分析社会福利的思想发端于英国牛津大学的高索普教授(John Goldthorpe)。1962年,高索普在《英国社会政策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in England)一文指出:功能主义的观点在社会福利研究上存在着局限,例如,要说明英国教育发展的特殊模式,就有必要摒弃功能主义观点的参考架构,而根据个人和团体为追求他们目标所采取的目的行动之观点来思考。高索普在此实际上指出了社会福利研究的另一个途径。1972年,两位英国学者乔治和韦尔德(Victor George & Paul Wilding)发表《社会价值、社会阶级和社会政策》(Social values, social class & social policy)一文,正式开启了冲突视角的社会福利理论。他们从个人和团体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角度来说明社会福利的产生和发展,指出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以及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是影响社会福利政策的最重要因素。英国学者沙维尔(John Saville)是最早运用冲突模型探讨福利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学者,他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是三个因素互动的结果:工业资本主义对一个更有效率的生产环境的要求,劳工阶级反对剥削所做的奋斗以及有产阶级为了政治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沙维尔指出:“福利国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尤其是社会民主政府的产物”。多姆霍夫(G.M.Domhoff)以美国为背景,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政时代的社会保障立法,本质上没有改变收入、地位和权力的分配即阶级结构没有实质变化,决策权力仍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普通大众被迫节省其收入的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高夫(Ian Gough)是以“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分析福利国家的学者,他试图把系统(整合)的解释与行动取向(冲突)的解释结合起来,认为福利国家既是一个冲突和矛盾的单位,又是一个功能整合的体系。德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学者克劳斯·奥非(Claus Offe)认为,不论是先进或落后的福利国家,我们看到的是“贫穷与富裕的共同存在……谋利的工业生产逻辑与个人需求逻辑的并存”。“福利国家”可以比较恰当地诠释为“为穷人的资本主义,为富人的社会主义”。波连查斯(Nicolas Poulantzas)运用结

构主义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ism Marxism)的理论,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阶级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自由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维持着福利国家的福利服务模式的原因。波连查斯认为,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不再是个别资本家的工具,它所关注的是整个资本阶级(capitalist class)的长期利益(政治利益)。巴伦(Paul Baran)和史威齐(Paul Sweezy)认为,进入福利国家时期的政府不再是放任主义和最低干预的政府,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工具。统治阶级通过福利制度来降低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政体的不满,争取劳工的国家认同,从而使阶级冲突得以消除。孟德尔(Ernest Mandel)更是直言不讳:福利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不是收入再分配的体系。他说:“很明显的,福利国家只是具有政治与社会目的的办法和社会机构的润滑剂,其用意在于避免爆炸,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在某些方面与劣势团体的相对贫乏是相互冲突或矛盾的”。

冲突论的社会福利理论属于价值判断的福利理论,它对福利国家的起源、演变及其本质的揭示是深刻的,有助于克服对福利国家认识上的片面与肤浅。但是,冲突论的福利理论只提供了社会福利演变的一般性原则,因而难以用于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

冲突论的福利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福利理论之间有两个显著的区别:其一,对社会福利的诠释途径不同。结构功能主义从实证研究中归纳出原理原则,对社会福利的诠释遵循“归纳逻辑”;冲突理论从社会学理论演绎而来,再来解释社会福利的现实,这是一种“演绎逻辑”。其二,对社会福利的观念基础的态度不同。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在“共识”的观念基础之上,冲突理论则充分考虑到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福利发展的影响作用,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共识”形态,而是不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相互折中的结果,它们孕育了不同社会结构内不同模式的社会福利。因此,冲突论社会福利理论的提出,为诠释不同社会之间的社会福利差异提供了一个较佳的途径。把两种理论视角结合起来,可以为全面的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

(编辑校对:余朝锡 史爱平)